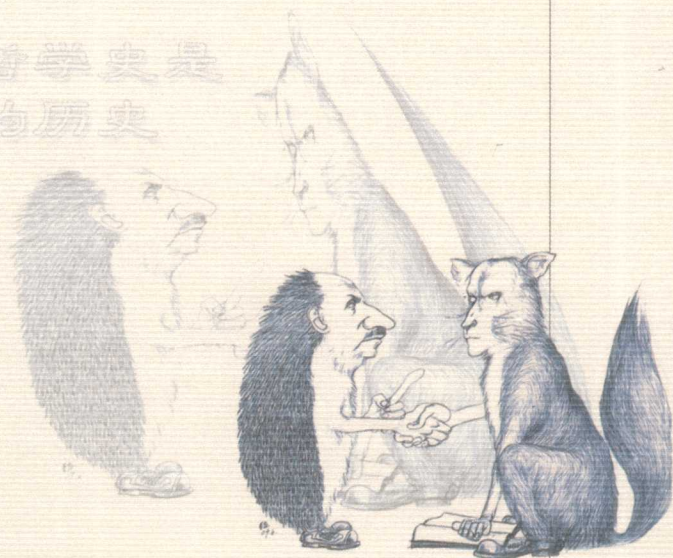


XIANDAI XIFANG ZHIXUE DE JINGSHEN

李超杰 著

现代 西方哲学的精神

二十世纪的哲学史是
刺猬与狐狸的历史



商务印书馆

现代西方哲学的精神

李超杰 著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西方哲学的精神/李超杰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ISBN 978-7-100-06601-3

I. 现… II. 李… III. 哲学—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IV. B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449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现代西方哲学的精神

李超杰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6601-3

2009年8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3 1/4

定价: 41.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一、从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	3
二、后形而上学时代西方哲学的新趋向	10
三、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	15
第二章 叔本华	21
一、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叔本华的本体形而上学	25
二、理念、艺术、音乐：叔本华的审美形而上学	37
三、人生的痛苦与解脱：叔本华的道德形而上学	41
第三章 尼采	55
一、虚无主义	59
二、真理意志	71
三、道德谱系学	73
四、超人学说	82
五、永恒轮回	96
第四章 弗洛伊德	109
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思想	116
二、梦论	125
三、文明观	130
四、宗教观	137
第五章 柏格森	149
一、生命、意识、绵延与自由	152
二、理智与直觉	162
三、道德与宗教	169

第六章 詹姆斯	183
一、实用主义:刚柔兼备的哲学	186
二、实用主义:解决形而上学争论的方法	190
三、实用主义:真理发生论	192
四、彻底的经验主义	197
第七章 杜威	205
一、经验自然主义:经验与自然	208
二、实验主义:知与行	213
三、工具主义:真理观	216
第八章 波普尔	225
一、认识论中的两个基本问题	229
二、猜想与反驳:科学方法论	234
三、真理观	239
四、客观知识论	244
五、历史主义批判	250
第九章 维特根斯坦	269
一、前期维特根斯坦	274
二、后期维特根斯坦	284
第十章 胡塞尔	301
一、描述现象学	305
二、先验现象学	317
三、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与生活世界现象学	323
第十一章 萨特	331
一、自在的存在	336
二、自为的存在	337
三、为他的存在	347
四、自由观	357
后记	374

第一章 导 论

“二十世纪的哲学史是刺猬与狐狸的历史，是那些努力想认识一件大事物的哲学家与那些只满足于认识许多小事物，甚或只是一件小事物的哲学家的历史。”

“最重要的是把二十世纪哲学的两个对立要素重新统一起来，即用那些主要是大陆传统中的高瞻远瞩、明察洞见和比较人道的与有文化修养的事宜来补足最近英、美传统中分析派的、实用主义的和语言学派所关心的事情。”

“如果接受了这个观点，豪放的哲学家们就会放弃无需认识或者感知许多小事物就能认识一个大事物的思想；而小哲学家们也就会努力去认识大事物了。”

——M. 怀特：《分析的时代》



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二十世纪的哲学史是刺猬与狐狸的历史

关于西方哲学的分期,人们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西方的很多“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都是古希腊一直写到20世纪。比如,梯利(Frank Thilly, 1865—1934)、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和斯通普夫(Samuel Enoch Stumpf)等人的《哲学史》都是从小希腊写到晚近的哲学。“Modern philosophy”在西方则多从笛卡尔(Rene Descartes, 1596—1650)开始,即包括了我们讲的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多年以来,我国的“西方哲学史”教材和课程大多都是从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 公元前624—前546年)讲到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而把黑格尔以后的西方哲学叫做“现代西方哲学”。黑格尔以后的西方哲学既是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的延续,又表现出若干不同于以往的新趋向。

一、从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

(一) 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史前史——前苏格拉底哲学

哲学始于惊异(wonder)。人们惊异于外部自然界的变幻莫测、残酷无情,也惊异于人自身的旦夕祸福、生老病死。正是由于这种惊异,人产生了在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性、在短暂的背后寻求永恒的愿望和冲动,于是,产生了哲学。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Socrates, 公元前469—前399年)的希腊哲学表达的都是这样一种冲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语)。然而,前苏格拉底哲学并未在哲学理论上确立形而上学的基本框架,并未形成完备的形而上学体系,世界二重化和主客二分的原则在他们那里并未建立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前苏格拉底哲学只是形而上学的史前史。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大多用自然的原因解释自然。他们用自然界中的一种元素或几种元素或自然事物的某些规定性去说明世界万物。在他们那里,世界只有一个,这就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精神和

物质、灵魂和自然是浑然一体的：自然往往是充满灵魂的，灵魂往往是被物化了的，具有物质性元素的某些特征。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中，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鼎盛年约在公元前504—前501年)似乎是个例外，因为他区分了存在者与非存在者，也区分了存在者和思想。但我们不能在近代的意义上理解巴门尼德的存在者和思想。他的存在者不仅是惟一的、永恒的和不动的，而且还是有限的，“存在者有一条最后的边界，它在各方面都是完全的，好像一个滚圆的球体，从中心到每一个方面的距离都相等。”¹可见，他的存在者尚未和具体事物完全分离。他提出了思想与存在者同一的命题，但他的思想也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理性思维，而是一种具体的直观活动。所以，我们说，巴门尼德也没有达到形而上学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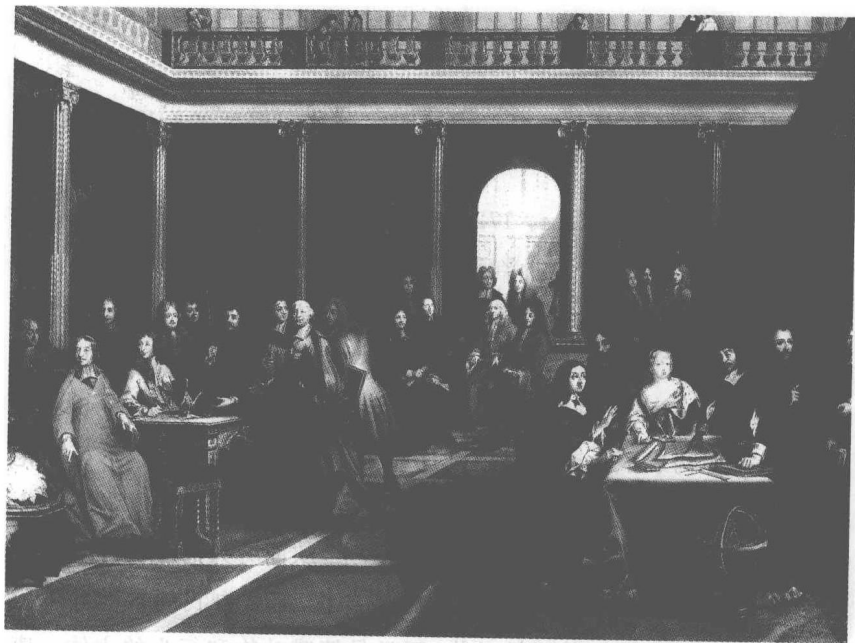
(二) 本体形而上学的确立——柏拉图哲学

苏格拉底哲学开启了希腊哲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他不满意用自然的原因说明世界，而是致力于同类事物中共同本质的寻求，致力于概念性知识的获得。这样，早期希腊哲学中“一”与“多”的问题经他之手就转化成了“一般”与“个别”的问题。但根据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的看法，在苏格拉底那里，一般尚未和个别完全脱离，这一工作是由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9—前347年)完成的。柏拉图的理念(ideas)是先于具体事物、在具体事物之外并独立于具体事物而存在的。于是，在他那里就出现了截然分明的两个世界：一个是由各种理念构成的世界，一个是由各种具体事物构成的世界。理念世界是真实的、永恒的，是本质；现实世界则是不真实的、流变的，是现象；理念世界是知识的对象，现实世界只是意见的对象。就其积极的方面而言，两个世界的划分表明了人类思维能力的提高。它以极端的形式提出了“共相”和“殊相”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通过各种变形不断地困扰着我们。它也以极端的形式启示我们：不仅要看到“一切皆流，一切皆变”的一面，同时要看到常住和永恒的一面；人既生存于时间和空间中，又有超出时空限制的强烈愿望；人既需要感性的现实世界，又需要精神

寄托。从其消极的方面看,两个世界的划分使哲学家重理念世界,轻感性世界;重概念,轻具体事物;重本质,轻现象;重理性,轻非理性。于是造成了哲学和生活的疏离。柏拉图哲学意义重大,它以哲学理论的形式在西方哲学史上首次确立了世界二重化原则,从而构成了形而上学的第一个阶段——本体形而上学。柏拉图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形而上学家。

(三) 主体形而上学的确立——笛卡尔哲学

古代哲学的研究重心是本体论,以世界二重化为标志的本体形而上学是古代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总的说,古代哲学处于主客未分的状态,尚未把主体抬高到与客体相对的高度,进而从主体出发去建立和论证客体。中世纪哲学处于神学的统治之下,人从属于神,人权从属于神权,人性、理性从属于神性,因此,很难有人的主体性可言。真正把主体和客体对立起来,并从主体出发去建立和论证客体的是笛卡尔。笛



克利斯提娜女王和笛卡尔的辩论

卡尔的“我思”哲学标志着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确立。就其积极的方面而言,“我思”的确立标志着自我的发现和觉醒,标志着哲学的进步。人不仅是世界的一部分,也不仅是诸在者之中的一在者,人还以自我和世界相对,以自我为世界划定界限,以自我建构世界,以自我为世界赋予意义。在笛卡尔以后的近代哲学家看来,哲学的主题就是自我,而自我就是思维着的主体,就是“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者一个理性。”²“我思”的确立,主体和客体的明确区分,也就是对象性思维方式的最终建立,这种思维方式大大推动了西方近代以来科学的发展。就其消极的方面来说,自笛卡尔以后,几乎所有近代哲学家都从“自我”出发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个不证自明的“自我”发展到最后不再是经验的“我”,而是普遍的“我”、绝对的“我”、先验的“我”,这样的“我”当然就是超时空、超历史的;而且,我的本质就是理性(广义),就是认识。思维的能力是无限的,理性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我们正确使用理性,我们就能穷究世界整体,就能把握现象背后的本质,一句话,我们就无所不能。这就使哲学陷入了“独断论”。

(四) 在传统形而上学框架内试图突破这一框架的企图——康德哲学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哲学对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性总结,这种批评是在对纯粹理性的分析批判中展开的。而这种分析批判的结果则完全是消极的:理性的认识能力不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人们只能认识现象,不能认识本质、本体、物自身(things-in-themselves)。物自身是超出可能的经验范围之外的,因而构成了认识的界限。这就是康德的不可知论。不可知论是康德哲学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它不仅大大动摇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而且使人从万能理性的高压下解放出来,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如果说哲学的主题是自我,那么自我的本性并不就是思维;人不仅是认识的理性动物,而且是情感动物和行为的主体。康德哲学是充满矛盾的哲学,也是不彻底的哲学。这种矛盾和不彻底性



康德和他的朋友们

只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才是可以理解的：康德哲学是在形而上学框架内突破这一框架的企图。康德以后，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1775—1854)和黑格尔都认为，康德哲学的不彻底主要是他的物自体学说和不可知论造成的，于是，他们纷纷起来批判不可知论，这种批判导致了为康德所批判的传统形而上学的复兴。

(五) 形而上学的顶峰与终结——黑格尔哲学

黑格尔哲学是从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开始的。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哲学的最大失误是假定了一个和意识格格不入的、空洞抽象的物自身，并视理性自身的矛盾为非法，从而割裂了思维与存在，导致了不可知论。于是，黑格尔以他的思维和存在辩证同一哲学反对康德的不可知论。黑格尔认为，要消除康德的“物自身”，首先必须假定思维和存在的同质性。“哲学的最后的目的和兴趣在于使思想、概念与现实得到和解。”³“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⁴这样，理念、理性不再像康德那样是纯粹主观的，而是

事物、对象的本质,是世界的灵魂。“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本性。”⁵这个既为实体又为主体的理性、绝对精神并不像康德所认为的那样是排斥矛盾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发展过程。理性自身中矛盾的存在,非但不是理性有限性的根据,相反,恰恰是理性的本质



黑格尔

所在。我们看到,自柏拉图肇始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以其庞大的逻辑体系论证了本体形而上学的世界二重化原则;以膨胀了的、神化了的理性哲学使近代主体形而上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毫无疑问,黑格尔哲学曾是具有很强的革命性的哲学,他以理性为武器,反对 17、18 世纪的机械的因果决定论,论证、高扬人的自由。然而,理性片面发展的结果,也会直接危及人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在这种理性哲学中,不是人支配理性,而是理性支配人;个体是服从整体的,欲望、情感、本能是从属于理性的。所有这些都明显地和现代意识不合拍。黑格尔以其绝对形而上学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

(六) 后形而上学(post-metaphysics)时代——黑格尔以后

黑格尔以后,西方哲学的发展呈多元化趋势。在对待黑格尔哲学的

态度上可以区分为两种相反的运动：一个是黑格尔复兴运动即新黑格尔主义(Neo-Hegelism)，一个是非黑格尔化运动。这两种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不满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这样，以反传统形而上学为己任的大部分现代西方哲学家都绕过黑格尔，回到康德，即回到康德所开始的工作上去。“回到康德去”(back to Kant)不仅仅是新康德主义(Neo-Kantism)的口号，也几乎是现代西方哲学家的共同呼声。

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家们在批判形而上学的过程中试图表明：传统形而上学并不是哲学的惟一可能性，或者说，形而上学并不是思想所必



海德格尔

须承担的一种命运。与此相联系，很多现代西方哲学家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下述两种倾向：一是向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回归，一是向东方思想的靠拢。这两种倾向所表达的是一种共同的愿望：超越和克服西方的传统形而上学。就第一种倾向而言，尼采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表现得十分突出。尼采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一针见血、痛快淋漓的，历史上的大哲学家似乎都达不到和他对话的高度。于是，他回到了柏拉图之前的希腊悲剧时代，回到了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约公元前 540—前 480 年)。“我怀着崇高的敬意对赫拉克利特之英名刮目相看。”⁶因为赫拉克利特肯定矛盾，肯定短暂，肯

定生成,一句话,肯定生命。海德格尔也十分欣赏前苏哲学,因为那时人与世界尚未对立起来,人还不是主体,世界也不是主体的“对象”。人首先存在世,和世界融为一体,后来才成了主体,才开始对世界做主题式的研究。就第二种倾向而言,我们可以举出叔本华和海德格尔。叔本华大概是迄今为止惟一真正精通东方思想并使它与自己的著作相关联的伟大的西方哲学家。他不满足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大厦,试图借助古印度思想特别是《奥义书》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进行改造。而旨在克服西方哲学主客二分模式、试图回溯到主客未分的本源境域的海德格尔,更是转向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寻求思想资源。在20世纪30年代思想转向之际他就已经开始引用老庄,40年代更是曾经与台湾学者萧师毅共同翻译老子《道德经》。尽管这一译事最终并未完成,但与中国哲学的这种具体而生动的“对话”,无疑使海德格尔加深了对中国哲学的了解,从而更加坚定了恢复或开辟一种非形而上学之思的信念。

二、后形而上学时代西方哲学的新趋向

(一) 从“认识论转向”(epistemological turn)到“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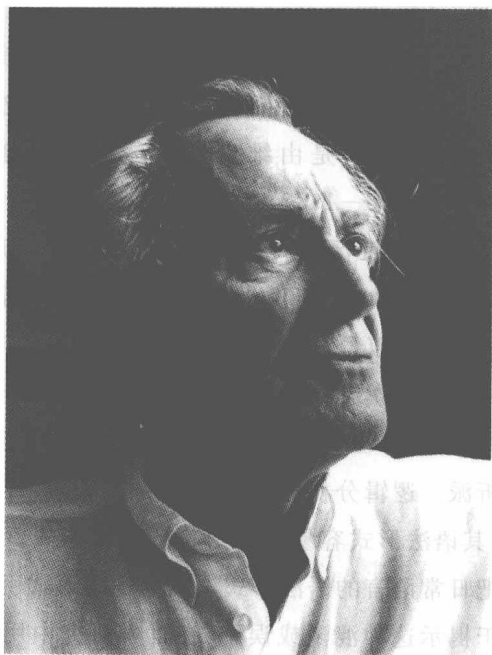
黑格尔以后特别是20世纪以后,西方哲学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所谓“语言学转向”。一般认为,西方哲学的发展迄今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转向。古代哲学的重心是探究世界的本原或始基,探究世界的存在及其状态,因而总体上处于“本体论阶段”(ontology)。近代哲学当然仍要面对和解决本体论问题,但哲学家们不是“独断”地直接讨论世界及其存在,而是把对主体及其认识能力的研究视为本体论研究的前提条件,于是西方哲学发生了所谓“认识论转向”,即从“本体论阶段”进入“认识论阶段”(epistemology)。黑格尔以后的现代西方哲学家们发现,传统哲学的很多问题和争论都和语言有关,就是说,近代认识论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言的使用。因为一切认识或

思想都是通过语言进行的,如果没有语言,我们不但不可能进行认识和思想,而且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于是,西方哲学发生了第二次“范式转换”即“语言学转向”,语言问题上升为哲学研究的首要问题,甚至全部哲学问题都被归结为语言问题。应当说,西方哲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有语言哲学的性质,所以,语言哲学的历史和哲学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但传统哲学家们对语言基本上持一种工具论观点,认为语言是人们用来表达思想的工具(这意味着在使用语言以前,思想已经“存在”了),所以,他们关注语言的目的只是为了更有效、更清楚地表达思想。但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哲学家们不再把语言仅仅看做是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而是更多地关注语言与思想、语言与存在本身的密切联系,关注我们在语言中的“存在”,关注思想在语言中的“生成”,关注语言的界限。“语言学转向”最早是由维也纳学派的古斯塔夫·伯格曼(Gustav Bergmann, 1906—1987)在《逻辑与实在》(1964)一书中提出的。但使这个说法得到广泛流传和认同的,则主要是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1931—2007)所编《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1967)一书的出版。可以说,最初提出和关注“语言学转向”的主要是来自分析哲学传统的哲学家,他们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失误”或“问题”在于对语言的误用。在分析哲学传统内部又可以分为两派:逻辑分析派和日常分析派。逻辑分析派或理想语言派认为,日常语言是粗糙的和不够精确的,其语法形式容易掩盖语言的逻辑形式。传统形而上学命题就是由于把日常语言的语法形式误认为逻辑形式引起的,所以,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揭示这种混淆或误用,在哲学研究中用一种理想的人工语言代替日常语言。与此相反,日常分析派或日常语言派则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是精确的和完善的,传统形而上学命题是对日常语言的误用造成的,所以,哲学的任务不是在日常语言之外发明一种理想的语言,而是要揭露形而上学对日常语言的篡改或误用,从而回归日常语言。实际上,“语言学转向”不限于分析哲学,现象学和存在哲学同样对语言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海德格尔就提出了“语言是存在的家”的名

言。在一定意义上,“语言学转向”是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共同特征。

(二) 从“现代主义”(modernism)到“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20 世纪特别是 20 世纪中期以后西方文化舞台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后主义”(postism)的登场,“后现代主义”即是这一潮流中的执牛耳者。一般说来,“现代”指的是中世纪黑暗时代以后、始于文艺复兴的那个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近代”。从哲学上说,“现代主义”始于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广义)哲学。随着笛卡尔“我思”哲学的出现,“理性的人”成了宇宙(自然和其他动物)的主宰,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



利奥塔

了“主奴关系”,自然变成了人认识、驾驭、盘剥的对象,变成了一个实验室和大工场,其惟一价值在于它的有用性;人与人的关系也成了主体与客体、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现代主义”制造了很多现代神话,包括主体、理性、真理、本质、整体、同一、进步、解放等等。这些新神话非但没有真正给人带来解放和自由,反而构成了对人的进一步压制。正是在